

清末民初的境外茶业考察及其影响

樊汇川 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安徽合肥 230026)

【摘要】受新兴茶业生产国竞争的影响,19世纪末,华茶在国际市场上从巅峰一路跌至谷底。有识之士从普通商人到朝廷大员不仅纷纷呼吁茶业改良,而且为此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茶业考察,如组团专程实地考察印锡日等新兴产茶国,通过驻外公使调查英美俄茶叶消费国的市场,利用参加世博会等机会考察茶务等,直接或间接了解当时国外茶业发展信息。通过对比分析,提出改良思路,从茶树栽培、茶园管理、制茶机械和技术的引进和使用,到公司化经营、广告投入,再到厘税体制改革等等,几乎涵盖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考察的成果被应用于国内茶业改良实践,并取得一些成效,但受当时条件制约,考察也还存在诸多局限。

【关键词】茶业改良;茶业考察;华茶;晚清;民国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2-0066-11

On the Overseas Investigation of Tea Industry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FAN Hui-chuan SHI Yun-li

(Department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Archaeology,USTC,Hefei 230032)

Abstract: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ffect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the emerging tea-producing countries, the position of China tea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ent down from peak to trough. In order to get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ea industr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ordinary merchants to court officials, all the far-sighted personages in China not only advocated and appeal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 industry, but also conducted different forms of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s on it, such as organizing group visits and field surveys to explore the new tea-producing countries like India, Ceylon, and Japan, or investigating tea transactions by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like World Expo.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y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improvement, involving almost all the aspect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from tea cultivation, tea garden manage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tea machinery and technology, to company management, advertisement expenditure, reform of tax system,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those investigations were applied to the domestic practi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 industry, which proved rewarding, however, owing to the limited conditions, there existed some limitations in the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improvement of the tea industry; investiga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China tea; Late-Qing Dynasty; Republic of China

【收稿日期】2017-07-03

【作者简介】樊汇川(1989-),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茶业改良史、中外茶叶技术交流史;石云里(1964-),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科技交流史、天文学史。

1923年,有学者称,自己曾翻到三十年以前科举考试的时务策论中“就有关于茶业改革底作述”^①。该策论正是华茶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朝野作出的反应。此后,随着华茶外销江河日下,改良之声渐成风潮。作为茶业改良的前期准备,对外国茶业的考察蔚然兴起,从专门组团出国考察,到委托驻外公使或利用参加博览会等其他机会进行专项调查,可谓途径多样;考察对象既有印度、锡兰、日本等新兴产茶国,也包含英国、美国、俄国等主要茶叶消费国^②。这些考察虽然存在着诸多局限,如考察者欠缺专业素养,考察的深度和广度不足等,仍旧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为中国的茶业改良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参考。对这一时期的对外茶业考察此前研究者虽多有提及,但尚缺乏系统整理,仍值得作为专题做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本文结合新发现的史料,拟对清末民初国人赴境外进行茶业考察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背景和动因,厘清考察过程和主要内容,并探讨其对中国茶业的后续影响^③。

一、境外茶业考察的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和利用茶叶的国家,饮茶的习惯在汉代已较为普遍。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汉代时茶叶便作为商品从内地输入到藏区^④。此后,茶叶作为重要的贸易品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向西传播。目前已知最早的中西方茶叶贸易可追溯到5世纪末,土耳其商队出现于华北边疆地区,以物易茶^⑤。茶树的种植和茶叶的制作技术先外传至朝鲜,后于唐代传入日本^⑥。世界近代史上的中西方茶叶贸易始于16世纪,来自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先后将中国茶叶带回欧洲^⑦。

英国人经营茶叶贸易始于17世纪中叶。18世纪初,受到国内新兴纺织工业的制约,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原来从印度进口纺织品的生意转向从中国进口茶叶,贸易额迅速增长。到1717年,茶叶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商品中的最主要商品。1767年开始,英国数次降低进口茶税率,进一步促进了华茶贸易额的增长。进入19世纪,华茶出口贸易继续保持增长势头。美国商人也开始从广州进口茶叶,除了

① 养真:《停闭了的安徽茶务讲习所底印象记》,《中华农会学报》1923年第37期。

② “茶业改良”是晚清民国茶业界和茶学界人士对当时茶业发展方向的普遍倾向,其主张包括:提倡用机械制茶替代手工制茶,倡导制茶技术标准的统一,主张对茶业结构进行整合以促进华茶对外贸易;等等。近年来一些技术史研究学者倾向于反思这一时期改良主张所提倡的机械化大生产模式的负面影响。

③ 清末民初的对外茶业考察是我国当时茶业改良的重要前期工作。关于这一时期对外茶叶考察的已有研究多见于晚清民国时期茶业危机和茶业改良的文章中。代表性成果有:彭南生《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6期;王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陶德臣《英属印度茶业经济崛起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陶德臣《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茶产业的影响与打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④ Lu, H. et al.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Sci. Rep. 6, 18955; doi: 10.1038/srep18955 (2016). 2016年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与国内外同行合作,对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和西安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疑似茶叶食物残体进行了植物鉴定和年代学分析工作,通过对现代茶叶标准样品的色谱-质谱分析,明确鉴定出两处遗址中均有茶叶的生物标志物:咖啡因和茶氨酸。此外,通过C14测定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植物的年龄距今约1800年左右,属于西藏古象雄王国时期;汉阳陵出土植物年龄距今约2100年左右。这一发现为我国早期茶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⑤ F. Brinkley. China,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Boston and Tokyo: J.B. Millet Company, 1902. Vol.12

⑥ 日本红茶协会:《20世纪の日本红茶产业史》,2003年,第1-3页。

⑦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供应本国消费者,还倒运到英国,直接挑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华茶出口额逐年递增,到1835年达到2.5万多吨^①。

与此同时,华茶在另一个重要销纳国——俄国的销量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变化。广义上的中俄茶叶贸易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1453年,来自布哈拉和西伯利亚的驼队穿过北方鞑靼统治区域来到北京,出售毛皮换取茶叶、宝石和金银^②。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中俄间茶叶贸易开始常态化。雍正五年(1727)《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开始边境互市。当时规定俄商在恰克图出售商品后不能以金银结算而只能换取茶叶,客观上也促进了华茶入俄贸易的增长^③。此后,由于汉口和福州口岸的开放,俄国茶商直接在两地收购茶叶并设立砖茶厂,使得中俄茶叶贸易进一步增长,1861年至1870年间年均输入华茶约125000公担,1871年至1880年间年均输入华茶达300000公担以上^④。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数次开埠通商,华茶出口持续增长,至19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光绪二年(1876)以后历年的茶叶出口均有关册可查,茶叶出口最盛时期,在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十四年(1888),这十年里“每年出口都在二百万担以上”^⑤。当时华茶的主要销纳国依次为英国、美国、俄国。

由于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早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便开始尝试在印度发展植茶业。但当时缺乏茶种和相关的制茶技术,同时还受到垄断华茶贸易并获得巨额利润的东印度公司的阻挠,鲜有成果。1833年以后,由于对华茶叶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东印度公司转而开始扶持印度的植茶业。1834年,为了推进印度植茶业发展,时任英属印度总督本廷克(Bentinck)主导成立了印度茶叶委员会^⑥。经过数十年发展,印度茶业不仅在种植面积上增长迅猛,制茶技术也开始不断突破。1860年以后,揉捻机和烘干机等制茶机械的发明和改进,不仅大幅提升了制茶效率,还有效降低了制茶成本^⑦。印锡等新兴产茶国快速崛起,很快在国际茶叶市场对华茶形成了巨大威胁。

19世纪末,先是受新兴产茶国印度和锡兰茶叶的冲击,继而受爪哇茶和日本茶的冲击,华茶出口每况愈下。

从图1中可见,1876年之后印、锡茶产量增长迅速(锡兰茶起步较晚,所以在前十年里与印度茶相比显得无足轻重),尤其在1887年开始发力,两年之内实现对华茶的超越。此后,印锡茶节节攀升,华茶则江河日下。到了1892年,单是入英的锡兰茶已超过华茶的份额。

当时英国驻福州领事贾礼士(Carles)曾专门撰文描述华茶出口的衰退情形:“1897年,福州港茶叶出口量比上年减少16000千磅,茶叶种植变得几乎无利可图,建宁、延平两县和福州周边的茶农多半已改种其他作物以求谋生”^⑧。此后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仍在继续加剧。1904年华茶输入英国本土数量为2724万磅,而印锡茶已增至1.7亿磅,较华茶多出1.43亿磅,多出价值437.6万英镑^⑨。到了民国

①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林树惠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卷,第68页。

② Russian Tea Trade, Boston Courier. Boston, Massachusetts, Thursday, September 4, 1828. 笔者之所以称之为广义上的中俄茶叶贸易是因为这一时期莫斯科公国虽在扩张之中,但尚未占领上述两地区。直到1598年以后,沙俄才基本控制西伯利亚地区,而对布哈拉的吞并则晚至1868年。

③ The Tea Trade of Russia. North American and United States Gazette.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uesday, October 25, 1853.

④ 陈椽:《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485页

⑤ 静如:《论华茶失败之原因及今后茶商应行改良之要项(附表)》,《银行周报》1924,第8期第46-49页。

⑥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M]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Vol. 1. 138.

⑦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Tea. [M]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Vol. 1. 159.

⑧ Decline of the Chinese Tea Trade, The Daily Picayune, New Orleans, Louisiana, Tuesday, May 31, 1898.

⑨ 纪 鸿:《华茶衰败之由来及改良之借鉴伦敦通信》,《上海总商会月报》第1卷第2期,1921年8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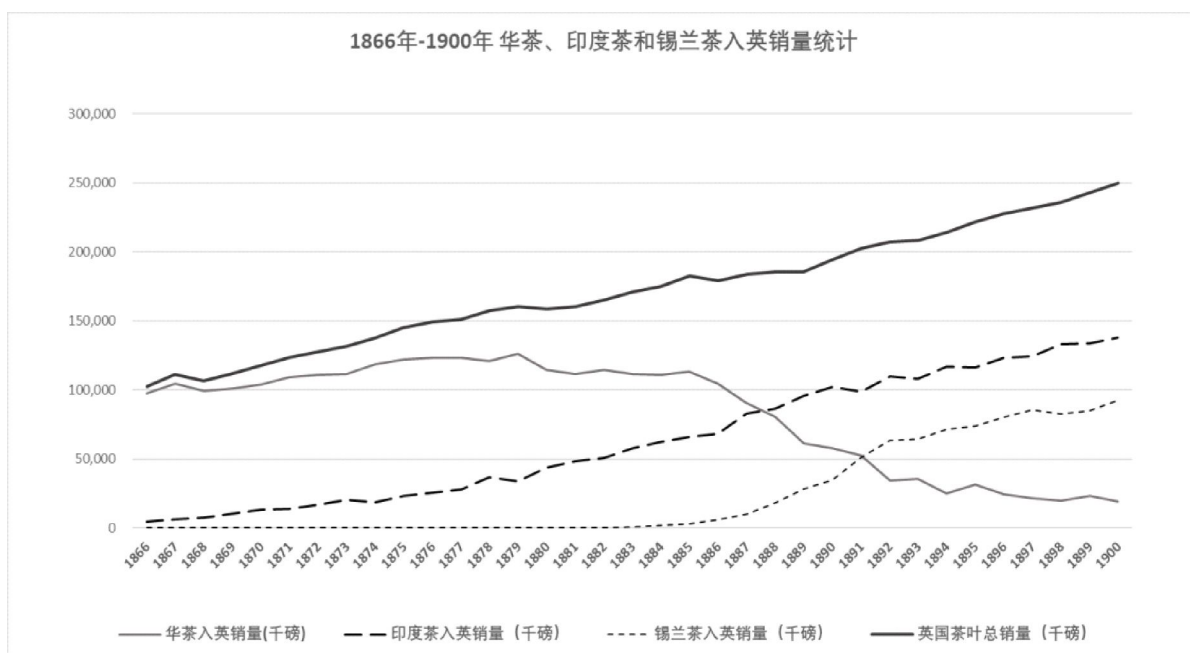


图1 根据 A. G. Stanton, "British-Grown Te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Vol 52, No.2689, 1904, p.610.
数据整理

时期,华茶出口减缩益甚。民国七年(1918)后,华茶年出口总额便降至不足百万担,民国九年(1920)更是仅有三十万担有零^①。

此外,1895年美国《洋际日报》的一篇文章也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华茶被印锡茶挤出英国市场的情形和原因:“1866年中国实际垄断了对英国茶叶贸易,中国茶叶供应占96%而英属印度只占4%;到了1894年中国茶在英国市场几乎全军覆没,市场份额只剩下12%左右,而来自英属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占领了88%的市场……制造上的不洁净和销售时的以次充好是中国茶失去英国市场的主要原因”^②。

继印锡之后,在国际市场上对华茶形成竞争和威胁的还有爪哇茶和日本茶。到民国初年,中国的红茶不但不能敌印锡,而且“被后进之爪哇争胜,而退居于第四位;绿茶则因日本之竞争居于第二位”^③。

印、锡茶叶在原本几乎专属华茶的俄国市场同样产生了强有力冲击。1907至1916年间,华茶输出量平均61.7%销往俄国。然而,其间俄国每年进口的约2亿磅茶叶中,来自中国者约占40%,印度和锡兰各占30%^④。

英印茶业侵占华茶市场的企图在一本名为《印度茶书》中有明确表述。“印度植茶之人,欲尽夺中国茶利,拟将中国售往各处之市场,使之根株锄绝,以销印度之茶。”通过减价倾销,使“中国佳茶,止留售于本国间,或运往俄国,可得善价”^⑤。

日本茶对华茶销售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北美市场。如前文所说,日本植茶历史虽可追溯至唐代,但在近代国际茶叶市场上产生影响则是19世纪晚期以后的事。1859年,根据《安政条约》相关规定,江

① 中华民国工商部:《历年华茶输出各国茶类统计表(民国元年至十七年)》,1929,第1卷,第7页。

② China's Tea Trade with England, The Daily Inter Ocean, Chicago, Illinois, Saturday, February 16, 1895.

③ 葛敬应:《品质增进主义的华茶救济谈》,《中华农学报》1923年第37期。

④ 蒋石洲:《中国输出之茶市(译自密勃氏评论)》,《中华农学报》1923年第37期。

⑤ [英]高劳:《印度茶书》,《农学报》1897年第37期第43页。

户幕府被迫对外开港通商。开港后第二年(1860)日茶首次输出国际茶市。当年出口额仅有 120 万斤^①,此后逐年递增,至明治元年(1868)达 1011 万斤^②。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振兴茶业的政策,茶叶的种植面积也随之迅速扩大,1892 年茶园面积超过了 6 万公顷^③。至大正五年(1917),茶叶出口额达 5017 万斤^④。此外,1895 年日本侵占台湾后,又大力发展台湾茶业,很快台湾的乌龙茶和包种茶也成为日本茶中重要出口的产品^⑤。

在新兴产茶国的强力冲击下,19 世纪末中国原有的茶叶生产和出口垄断地位很快崩溃。实际上,这场危机的出现并非偶然,在被新兴产茶国强势抢夺市场份额的现象背后,是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遇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竞争这一本质。为了认清危机发生的原因,并寻找振兴茶业的方策,清末民初时期许多仁人志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赴外进行茶业考察。

二、境外茶业考察的主要内容

(一)考察团赴境外考察茶业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危机到来之前,甚至早在 60 年代华茶出口产销两旺的时候,晚清洋务派中有人即已先知先觉,预测到华茶危机的发生。其主要依据是整个华茶出口的主动权被牢牢控制在洋商手中,华茶生产者和茶商的命运均为洋商所操纵,因此华茶出口本质上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茶业的控制与掠夺,这自然为茶业衰败留下祸根^⑥。但由于当时华茶出口量仍保持较快增长,这种思想并未能引起更多人的警觉。

目前已知最早涉及到茶业的对外考察是清光绪四年(1878)由四川总督丁宝桢委派的黄林材一行五人赴英属印度的考察。此次考察出于对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的考量,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英属印度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但也涉及到当地茶业的内容。如黄林材在其行记中多处描述印度的阿萨姆茶区情况:“英国人在阿萨姆试种茶树,有取得成功之势,每岁所得已达二十万银……英人所雇茶师,多来自我国闽广……英人近来又仿打箭炉(打箭炉即今四川康定——笔者注)川茶之式,成毡成包由大吉岭运入西藏,脚费既省,价钱也廉价”。^⑦尽管考察者对茶务并不熟悉,考察报告中与茶业相关的记述也甚为简略。但此次考察较早地了解到了英属印度茶业的实际情况,并准确预测了其对华茶业的潜在威胁,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01 年,赴印锡专程考察茶业的设想再次被提出来:“今宜遣熟悉茶务者及能文之士,分赴印度各省,详求种植焙制之法,记载成书,归而仿行之”。^⑧四年之后,这一设想即成现实。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三月,受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委派,江苏候补道台郑世璜(1860 年生,浙江慈溪人)率团“赴锡兰印度考察茶土事宜,并谕抵印后往谒议约全权大臣唐少川星使,顺道考查印

① 加藤德三郎:《日本茶業史·統篇》,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1936 年,第 2 页。

② 加藤德三郎:《日本茶業史·統篇》,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1936 年,第 132 页。

③ 蒋石洲:《中国输出之茶市(译自密勃氏评论)》,中华农学报,1923 年,第 37 期,第 122-128 页。

④ 加藤德三郎:《日本茶業史·統篇》,茶业组合中央会议所,1936 年,第 133 页。

⑤ 邱显明:《日治时期台湾茶业改良之研究》,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 年,第 21-24 页。

⑥ 陶德臣:《洋务派与近代中国茶业》,《中国茶业》2010 第 7 期。

⑦ 黄林材:《印度割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著易堂印,第 442 页。

⑧ 《劝中国茶商整顿茶务说》,《申报》第 10090 号,1901 年 5 月 23 日,第 1 版。

度晒盐收税诸法”^①。三月二十七日自宁垣附汽船赴沪,购定法公司同培亚船票,四月初九日启行。同行者浙海关英人副税务司赖发洛(Leonard A. Lyall),翻译沈鉴(字少刚,江苏青浦人)、书记官陆淦(字澄溪,江苏武进人)、茶司吴又巖(浙江嵊县人)、茶工苏致孝、陈逢丙(安徽石埭人),另有仆从二人。原计划同行还有罗君琳,惜于三月二十一日夜死于所乘元和轮火灾事故中^②。四月二十五日船抵锡兰哥伦坡港,六月十九日离开锡兰,二十七日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八月初六日离开印度,二十七日抵沪。全程历时 137 天,其间在锡兰 55 天,印度 38 天^③。

郑世璜在日记中提到,此次考察的往返川资费用,虽是竭力樽节,仍多达库平银八千四百五十余两^④。周馥肯花上这么大的一笔钱,按照郑世璜在其日记序言中的说法,是“厘念国计民生之本,必以振兴实业为要图,思一整齐而利道之。”考察团往来其间四月,不辞劳苦,而且把所闻所见最重要的内容均编入日记,“于茶业之所以盛,凡种植、采伐之法,碾筛、切焙之器,择其尤切于用者,条分件系,归而上之。”郑世璜自认为,这次考察虽不敢称能尽其详,但“彼此赢绌之故、兴衰之原,略可考见矣!”考察完成后,郑世璜提交了《郑观察世璜上两江总督周陈印锡种茶及烟土税则事宜》和《郑观察世璜拟改良内地茶业办法上江督禀》两篇关于茶业改良的详细报告,在报告中以其考察所得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改良国内茶业的设想^⑤。总体上说,此次考察在植茶、制茶和生产管理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达到了“知彼”的目的,对于现代制茶业形成了完整的印象,为日后华茶改良的方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此后,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不仅改良方案并未能付诸实践,对外考察亦耽搁下来。直至中华民国成立后,对外考察的呼声再起。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拖累了对外考察。关于这一点,从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农林总长陈振先签署的对中国茶叶协会总部的一折批文即可看出:

呈悉查茶业日衰,利权渐失,自应详细考察,籍为整齐利导之资,而收改良振兴之效。该协会呈请委任方兆鳌为出洋考察茶务员,自是为整顿茶业起见,用意深堪嘉许。惟现时部款支绌。筹垫维艰,所请优给资斧之处,碍难照准^⑥。

数年后,政府财政有所好转,对于振兴实业的渴望促成了新一轮对外茶叶考察的热潮。1915 年,为了加深对美国等新兴国家消费市场的了解,北洋政府农商部在组织国内各行业赴旧金山参加“1915 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同时,还专门成立了游美实业考察团,对国际消费市场的最新动向进行调查。鉴于茶业的重要性,考察团筹备所吴所长特地邀请了俞燮等数位茶业专家赴美国各主要茶叶消费地区对茶业的发展形势进行考察。

不同于郑世璜等赴印锡考察,此次考察重点是当时外国茶业消费市场。彼时,美国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茶叶消费国,各新兴产茶国都争相在美国市场拼得一席之地。俞燮在美期间先后考察地点 24 处,历时近 110 日(往返途中 50 日,考察 60 日),回国后在《中华实业界》上发表了《游美调查茶业报告书》^⑦,内容主要是美国茶叶市场的概况描述,对英国茶(即英属印锡茶)和日本茶在美国的优势以及

① 郑世璜:《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 156 册[影印本],学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77 页。唐少川即晚清民国时期我国著名外交家唐绍仪(字少川),1904 年至 1906 年间唐绍仪为清廷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就西藏问题谈判,故郑世璜在文中称其为“星使”。

② 郑世璜:《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 156 册[影印本],学苑出版社,2006 年,第 177 页。

③ 陆 淦:《乙巳年调查印锡茶务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 156 册[影印本],学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④ 陆 淦:《乙巳年调查印锡茶务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 156 册[影印本],学苑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⑤ 郑世璜:《郑观察世璜拟改良内地茶业办法上江督禀》,《南洋官报》1906 年第 34 期第 56-61 页。

⑥ 《农林部批第五十二号(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原其呈人中国茶叶协会总部》,《政府公报》1913 年第 245 期,第 19 页。

⑦ 俞 燮:《游美调查茶业之报告书》,《中华实业界》1915 年第 2 卷第 10 期。

华茶在美国的不足也作了深入分析。报告还对中国各类茶叶在当地的消费情况、世界各主要产茶国在美国茶叶市场的份额及价格对比、主要进口口岸和进口量作了统计分析;对美国的茶业销售渠道、销售环节、茶叶营销与茶叶广告以及其相关法律、定价以及消费者心理等方面信息均作了详细介绍;最后,报告倡议成立专业科研机构,并建议农商部设立茶务局以促进茶业管理。

这一时期华茶外销的路径与新兴产茶国有较大区别。印锡茶商多是产销一体,从枝头到市场均为一家茶商独自完成。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成本,易于控制品质,更重要的是茶商对于市场的动态非常了解,因而能够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反观华茶则几乎全是通过洋商转口贸易,国内业界对于世界主要消费市场的动向、消费者喜好以及竞争者的策略知之甚少,完全处于盲目的被动状态。因此,作为较早对外国茶叶消费市场进行的系统性考察,俞燮的工作大大增进了国内业界对外国市场的了解。在考察报告中,俞燮还提出重视包装、增加广告投入、建立出口商检机制等主张,不仅对当时华茶的外销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乃至以后。

日本茶业崛起虽然较印锡晚,但发展迅速,其对华茶的威胁主要在绿茶市场上。就在赴美考察归国后的次年,俞燮受安徽省代省长倪嗣冲的委派,又率团赴日本进行茶业考察。此前,俞燮在赴美考察归途中曾应侨居日本的孙润江邀请,短暂考察过日本茶业,但“以时间短促,未获求详至”,连其本人也甚为遗憾^①。

俞燮一行于1916年10月16日启程赴日本,同行者有安徽公署实业科员徐思齐、省立农事试验场场长郑奂之、省立第一桑习所所长陈仁辅。他们自上海虹口搭乘三菱轮船公司博爱丸号,两天后抵达日本长崎,后换乘渡轮至广岛。在日期间他们先后考察日本中央农事试验场制茶所、静冈县农业试验场茶业部等茶业科研机构,拜访日本制茶专家并广泛购买日本当时关于茶业改良的书籍,还参观了静冈制茶器械制造厂,学习新式制茶器械的使用。考察团于12月1日返回上海,前后历时46日。回国后发表了《考察日本茶业报告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制茶技术的最新情况,涉及日本茶的播种法、采摘法和茶业机械的使用,茶质分析试验,肥料与茶叶内含物关系的分析试验,等等;还详细介绍了日本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茶业讲习所的设立情况^②。同行的徐思齐科员也于翌年翻译发表了《日本制茶新书》,对日本当时茶叶生物化学和茶树栽培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详细介绍^③。

(二)通过驻外机构进行茶业考察

除了组团专程考察外,这一时期了解外国茶业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驻外机构开展茶业调查。就在郑世璜考察印锡之前一年(1904),清廷要求驻俄使臣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兴人,1863-1933)考察俄国土产市场行情。考察报告在《申报》上连载。胡惟德认为:“中国制品不敢望输售于英法德美,犹可望输售于俄。”而且分析了俄国不同地域的情况,认为“盖中国商务易于发达地,无如其腹地圣彼得堡及莫斯科新旧二都,与畿耶甫最旧都。细察此数处土著客宦各风尚,与夫列肆所陈列待售者,固以欧美制品为最珍,然亦不废中国制品。”

胡惟德指出,输俄华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包装不当引起的。他说“华茶或箱或罐,皆粗拙不堪入目,不能引起人愉快心,且一箱一罐分两过多,不适于售。”结果“市肆中不得不拆散箱罐,另以美丽花纹之纸或他料,按其风俗所需,分为小包以待售。”最严重的是“分包之时,搀入印度等茶,而茶味劣矣,是不啻以上等华茶代他茶受恶名。”他建议“何如我国自行改装,亦按其适宜之分两,盛以美丽之彩匣,加以慎固之封识,表明为中国运至之纯粹华茶。”他断言,中国茶只要按此施行,则“一年以后必群奉为珍品”。^④

① 俞 燮:《安徽省委赴日考察茶务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第1-2页。

② 俞 燮:《考察日本茶叶种植制造报告书-附表》,《安徽实业杂志》1917年续刊第8期,第1-15页。

③ 徐思齐:《日本制茶新书》,《安徽实业杂志》1917年续刊第4期,第10-14页。

④ 胡惟德:《出使俄国大臣胡考求中国出口土货公文》,《申报》第11341号(上海版)1904年11月11日第2版。

此外,农工商部于宣统二年(1910)请驻美大臣派员前往各商茶店调查各种华茶,选择其最易销售者,运回国内以资研究。驻美大臣按要求“购得洋商改装中国茶一种、华商运贩中国茶四种、英商改装印锡茶各一种、美商定装日本茶一种、美商及华商所运华茶各一小木箱、洋商改装华茶暨各国茶样三盒,一并由运送局呈缴到部。”农工商部将这些茶样分配成篋,并附上商务委员赵宗坛所作的说帖,分发给各地茶商。要求“悉心研究逐渐改良,务令华茶运售出洋销数日臻起色。……务期中国将来茶叶日臻优美,运销额数日渐增多,以挽利权而维商务。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①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亦重视对外国茶叶市场的调查。1913年,时任驻英国商务委员曾耀垣根据自己调查所得信息,总结出华茶从种植至运销英伦过程中产生费用的环节,包括植茶之人工、内地各个厘金税项、中国商贩等经手费用中国出口茶税、运茶到外洋的水脚、华茶入英国入口关税、在英码头栈租等费、英商运华茶入口者之赢利、在英销华茶者之中用、批发茶行之赢利、为零估者之赢利,等等。他指出,这十一次转折,每层皆有费耗,依次迭加,最后都要取偿于消费者,“无怪乎中国茶价之贵,而不能与印度、锡兰等茶争衡也”^②。

(三)利用参与国际展会考察茶业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完工,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举办了著名的“1915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博览会从1915年2月20日开展,到12月4日闭幕,展期长达9个半月,总参观人数超过1800万人,影响空前^③。各国政府为了提高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形象,促进出口贸易,都对参展事宜高度重视。北洋政府农商部组织在会场建设了规模庞大且极具中华建筑特色的中国馆,并汇集了10余万件器物参展。在此期间,参会的屠坤华、黄炎培、沈怡云、冯自由等人对当时各国茶叶的贸易、营销和入关检验等方面的情况作了大量的记录。此类利用参展机会搜集茶业信息的行为,亦可视为这一时期茶业考察的一种重要途径。

屠坤华,安徽宣城人,青年时曾留美攻读药学博士。在北洋政府筹备参加“1915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过程中,应邀作为直隶赴会代表团9名成员之一,参与赴美赛会事宜。后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完成《万国博览会游记》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上海)1916年7月出版发行。

屠坤华通过博览会中所见所闻,深切地认识到我国在税务和进出口管理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他在参观该市的海关过程中发现,“美国货之出入,极为便利,虽手续甚繁,然皆为免弊也。”从这里出口无税,入口纳税也视其货而分别对待,“凡为国人可制,抑或奢侈之品,则税重,保工兼以除害也。其非国内所有,又系平民必需要,则税甚微,甚或无之”。^④税之轻重“或询政党意见,或视市情盈亏,数年一变。”相比之下,国内的税制管理十分落后,“税制紊乱,太阿倒持,操纵于人掌握者,大相径庭”^⑤。

此外,屠坤华还重点介绍了美国海关的质检机构。“关内设有检查机关,尤以食品检查为密。检查员之职权极大。使某批货为若干箱。若曰必须逐一检查,则一箱难漏矣。若曰不合食律某条,则斥回之。虽有善于取巧者,至此亦失其故智也”^⑥。海关检查侧重于保护本国民众,如果进口的食品是专为我侨商用者,那就简单地看看而已;像茶叶等给本国公民食用的产品,则检查极为严密。

陪同屠坤华参观的海关官员认为华茶在美销售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着色掺伪。他说,“子邦茶

①《直隶劝业道奉农工商部札发茶样暨说帖照会商会转饬茶商研究改良文》,《北洋官报》1911年第2753号。

②曾耀垣:《华茶在英之销场情形及其改良方法》,《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3年第1卷第3期。

③Calif.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San Francisco:Remington Typewriter Company, 1915:5-9.

④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5页。

⑤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5页。

⑥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5页。

质,世无其右。何以政府任民作伪,此与自杀何异”^①。由于政府不作为,华茶作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为了躲避检查,不法商人想尽了办法。恰好参观当天就发现一批掺伪的华茶,该官员亲自带着屠坤华等一起至栈房,当面让屠指开一箱并当场各取少许,赴试验室验证。取同量的优、劣茶与标准茶,用同量的沸水分开浸泡,不用品尝,只需一嗅,便可分别。着色茶的检验方法也并不复杂,取一张白纸,铺茶数片,往返推压茶叶,加在茶叶中的颜料就会沁透纸面,如云斑然^②。据这位官员介绍,日本茶一开始也有着色掺伪之弊,因政府之厉禁,才很快被制止。日本等国经营茶业均力求进步,华茶失败,非是自己退步,实因为对手进步。

对包装和品牌问题,赵宗壇有更深入论述。据洋商称,华茶质味最佳,当时有很多英美茶商先是将所购华茶,掺入印、锡、日茶中,使之有华茶质味,易于销售。等到销路打开,渐掺渐少,逐渐改变饮茶者的口感。华茶高端茶价格不菲,次等茶又“装载粗劣,殊不雅观”,不注意外观包装,所以越来越失去市场^③。

在营销策略方面,日方的做法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他们在博览会的“陈列区旁另划一段,制为茶地模型,青树绿叶之中,有蜡制采茶女四五,笑容可掬。侧室玻璃,陈茶数种,外有说明英文册籍,任人取阅。用日本法,煮茗饷客”^④。沈亦云在《亦云回忆》中也有相似记载:“日本赴赛甚认真,他们的茶叶展览,附设品茗处,即在布景的茶田旁,采茶少女白衣白帽,洁而美的神气,宣传了表里一切”^⑤。黄炎培则称“某国出品有一幅采茶模型,茶树若干行,妇女采茶其间,收拾整洁,上加说明,使人知某国产茶制法之精洁”^⑥。

三、境外茶业考察结果的应用和讨论

清末民初的茶业考察,包括上述各种形式的境外考察和在国内进行的种种调查,均是为了摆脱当时中国茶业的困局而进行的,尽管有诸多不足,还是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为随后华茶的改良提供了重要借鉴。

郑世璜率团赴印锡考察之后,在其著名的考察报告《郑观察世璜拟改良内地茶业办法上江督禀》中,针对“印度、锡兰种茶制茶各法,中国究竟能否仿行”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虑到国内产茶区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他认为“惟有暂设官厂,并择简便易行之事先行试办一二年后,确有效果,然后分别筹劝商办,则全局改良不劳而自举。”为此,他还提出了以下八个方面的具体设想:择地设模范茶厂,以便商民效法;购置机械,尽可能节省费用;官厂事权统一管理;设法挽回花香溢利;禁用手足碾揉;专收青叶,如法仿制;编写白话普及丛书;设立学堂,以提倡风气^⑦。考察归国后第二年,郑世璜便在南京钟山脚下建立了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先行就茶树的种植、育种等环节进行改良的尝试,并对土壤、气候等因素对茶树生长的影响进行观测试验^⑧。五年后,北洋政府农商部祁门模范种茶场的建立则使其在改良报告中提出的关于设置专业改良机构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俞燮考察日本茶业归国后,先后发表了《宜推广茶栈于国外说》、《拟改良徽州茶业意见书》和《制

① 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6页。

② 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6页。

③ 《直隶劝业道奉农工商部札发茶样暨说帖照会商会转饬茶商研究改良文》,《北洋官报》1911年第2753号。

④ 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4-236页。

⑤ 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7页。

⑥ 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6页。

⑦ 郑世璜:《郑观察世璜拟改良内地茶业办法上江督禀》,《南洋官报》1906年第34期。

⑧ 佚名:《江南植茶公所试验成绩》,《广东劝业报》1909年第60期。

茶附属品应由茶号分工自制之必要》等文章,分专题论述茶业改良的方法,对如何改良当时的茶业提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主张,主要包括以公司集股的方式对零散茶号进行整合,以增强茶号在买卖中的议价能力,并且避免恶性竞争;政府对茶号进行监管,以捐贴方式,对不符合要求的茶号予以禁止;各茶号应重视刊登告白,商标和品牌形象建设;等等。

此外,为了改变“中国向来教育自教育,实业自实业,一似风马牛不相及,无所谓实业教育”的局面,俞燮于1918年在时任安徽省长黄家杰的支持下,按照日本茶务讲习所的模式,在徽州建立了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为茶业改良培养专业人才^①。尽管该所仅开办了3年时间便因时局动荡停办,仍为当时的华茶业培养了一批重要的改良人才,如胡浩川、付宏镇等。

胡惟德考察俄国土产市场行情时就指出了华茶包装粗劣对销售的不良影响。屠坤华也指出在美国市场上也存在包装和缺乏属于自己的品牌的问题。赵宗壇针对所了解的华茶在包装和品牌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两方面着手改良:一是仿照日本、印度、锡兰茶的样式包装;二是正名,用自己公司的商标,将我国产茶地云峰之高秀、制茶机器之雅洁的照片印在商标纸上,以为表识,还要用中外双语文字说明。赵宗壇还进一步谈到,华茶销售中应重视广告,称洋人商务最重告白,要在销售地报上多登广告,使人知吾国茶叶制造日求改良,注意抵消竞争者对华茶负面宣传所造成的恶劣影响^②。

曾耀垣在其报告中,通过分析华茶在英国实际运销情况后,阐述了他对于改良华茶运销的主张。除了降低成本,改良制法之外,重点论述了“广刊告白”对于促进华茶销售的作用。他发现这一时期,英国消费者对于印锡等大叶种茶所含单宁过重的问题逐渐不满,转而寻求高品质的华茶。曾耀垣认为这正是推广华茶的好时机,并主张“华商不能以中国之成法与英为贸易”,应当学习希腊推销加伦子(醋栗)和巴西推销咖啡的方式,由政府补助经费广刊告白以扩张销路。他在报告中写道:华茶价格比较高,这早已是人们的共识,然而仅仅通过平抑其价,仍难以使销售有起色。出路在于借助于“广刊告白”,并通过张贴招贴,以晓之于众。当时国内对于广告的认识还很肤浅,他因此解释说:“此又非仅仅刊登价目数行即可谓毕其能事也。委婉以道之,亲切以言之,有引人入胜之思,有无微不达之旨。”曾耀垣介绍说,“纂登告白一事,在欧洲已成专门之学”;并且,作为一门新兴行业,其地位与医生、律师并重。他认为国内茶业改良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缺乏专业人才。还提出:“天下事惟专其道者,乃能得其用。举大重之任,而俾之以不习其事之人,在政府虽极意振兴,其终也不过虚掷黄金,一无效果。”对于广告费用,他认为“不当尽由此间华茶公会,或中国种茶业茶等户担任。”理由是此事关乎全国商务,政府必须负起责任,给予足够的补助^③。

这一时期的境外茶业考察提高了华茶业界对国际茶业发展情况的认识,考察结果不仅在当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更为华茶业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民国以后的华茶改良事业发展迅速,从茶学研究、人才培养、制茶机械的引进和使用、公司化运营到茶税改革、品质检验等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这些措施很多都得益于这一时期茶业考察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思路。

四、结 语

清末民初中国时局动荡,内忧外患,政权迭替,百业凋敝。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力挽华茶困局,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克服种种困难,通过不同途径开展境外茶业考察,实属难能可贵。相比于印锡茶商从

① 俞 燮:《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开学训词》,《安徽实业杂志》1918年第12期。

② 《直隶劝业道奉农工商部札发茶样暨说帖照会商会转饬茶商研究改良文》,《北洋官报》1911年第2753号。

③ 曾耀垣:《华茶在英之销售情形及其改良方法》,《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3年第1卷第3期。

枝头到市场一家经营的特点,华茶长期依靠洋行外销的模式造成了华茶业对国际市场和新兴产茶国的情况严重缺乏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茶业考察大大增进了华茶业界对国际茶叶市场和新兴产茶国茶业发展的了解程度,为华茶改良事业指明了方向。

尽管如此,从专业的视角看,这一时期的茶业考察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由于当时中国既没有专门的茶业科研机构,也无正规的茶学专业教育,所有外出考察者均非科班出身;即使是俞燮这样的“家世业茶”者,也自觉“茶业中殊惭鄙陋,茶事经验实不敢以自信”^①。这便导致考察的内容缺乏专业深度,多集中于制茶、包装等技术层面,而对当时在印锡和日本已经成为研究热点的茶树遗传学、茶树病虫害和茶叶生物化学等科学知识,却鲜有涉及。正因为如此,考察的成果虽然为后来的茶业改良提供了依据和思路,却未能从更深层面推动华茶业的现代化进程。

当然,这一时期茶业改良未能成功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受到自然经济下落后的生产关系以及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再加上国内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因此当时的中国茶业始终无法形成与印度、锡兰、日本等国茶业抗争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政府主导对茶业进行整合,以及国家资本的注入使得原本零散破碎的小规模生产的格局得以彻底改变,加之公有制体制下行政力量的干预促进了制茶新技术的应用和制茶技术标准的统一,中国茶业才开始真正步入现代化发展的模式。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李大祥教授和张梁副教授的无私帮助,论文初稿于2016年12月第十四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上报告时得到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倪根金教授的指正,特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 [1] 汪敬虞.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2]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M]. 中华书局,1962.
- [3] 朱自振. 茶史初探[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 [4] 陈 椽. 茶业通史[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 [5] 陈占彪. 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上接第 116 页)

#### [参 考 文 献]

- [1] 李 斌. 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10,(4).
- [2] 张宏卿. 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瑞金土改为中心的考察[J]. 开放时代,2013(4).
- [3] 杨丽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J]. 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 [4] 张建涛. 建国初期中共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原因探析[J]. 改革与开放,2010,(6).
- [5] 王 健.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取新解放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方法(1949—1952)——以沪郊土地改革为视角的观察[D]. 华东师范大学,2011.
- [6] 黎见春.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普选运动中政治动员的意义阐释[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3).

---

① 俞 燮:《游美调查茶业之报告书》,《中华实业界》,1915年,第2卷第10期,第1页。